新书评介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收获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评述

张小莉　张晨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课题，论述近代文化的著作也屡见不鲜。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9月第1版，以下简称《概论》) 就是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收获。全书分14章，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及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与同类著作相比，《概论》一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

一、系统阐述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文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文化”一词的概念问题。中外学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不下二三百个，大体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文化两大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文化”下过这样的定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是从狭义文化角度来界定的。这一观点为《概论》一书所采用。作者在《概论》“前言”中指出：“我们是按狭义文化来撰写的。具体地说，是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与政治和经济相应的文化。狭义文化较之无所不包的广义文化，所涉的内容要少得多，范围要狭窄得多，然而也还是很丰富、繁杂的，研究起来也不容易。”从这一定义出发，该书作者把近代文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确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概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近代文化与社会、近代文化的结构与特点、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中西文化论争、重要文化观念等问题，都作了深入研究。

《概论》首先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主权沦落，传统经济衰败，新的社会因素逐渐成长起来。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文化。另一方面，近代文化一旦形成，并不是被动地、消极地适应着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是对社会发展起着能动的反作用，积极主动地影响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近代文化与近代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双向互动的。

探讨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是《概论》的重要内容。该书通过比较中国近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的不同，把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

1. 近代经济的多种成分和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近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近代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在：既有资本主义文化，又有封

[收稿日期] 2001－02－10
[作者简介] 张小莉 (1975-)，女；张晨怡 (1976-)，女，二人同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北京 100875

建主义文化；既有殖民主义文化，又有爱国主义文化；既有西方近代文化，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近代文化区域性特征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展的东南沿海和沿江的地区，新文化因素形成较早。而在广大内地、农村，社会经济变化不大，文化发展比较落后，与沿海沿江一带的文化变化形成明显的反差。

2. 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一直是时代潮流的主题。近代文化的发展始终与这一历史主题息息相关，受到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

3. 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及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走上新的道路，贯穿着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会通融合。

4. 科学与民主是近代文化的核心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实际是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提高概括。科学的内容包括自然科学、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民主的含义同样广泛，既包括近代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又包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和变革。

5. 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由于近代社会变化太快，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消化以及对近代文化的创建，缺乏充分的内在准备，使近代文化不免带有缺陷。

《概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作了准确的论述，认为文化的发展变化固然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但它又是一个与经济、政治并立的领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考察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不能简单搬用社会政治史的时期划分标准，而应该按照文化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来把握。基于这种考虑，该书以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为界，把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现了这个阶段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近代文化衍变的进程来看，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萌发阶段 ，或者说是准备阶段。

第二阶级从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前。这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形成发展的阶段。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并同封建旧文化进行了激烈斗争；文化本身的问题也被作为对象来加以探索比较，不同的文化观和文化派别先后出现。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标志。甲午战后，随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也发展起来。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作者既不同意评价较低的“全面衰退”说，也不主张将其盲目拔高，而是作出这样的评估：“中国近代文化是在既批判地继承了固有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古代文化而言，整个近代文化体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进的、活跃的、生气勃勃的。这 80 年文化的变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无疑是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对前而言，它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又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主义文化腐朽、呆滞、沉闷的局面，建立了进步的、丰富多样的、活泼的新文化。对后而言，它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尽管这时期的新文化并不成熟，没有完整的体系，甚至是幼稚的、粗糙的，但没有它，就不会有后来的新文化，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第 19 - 20 页) 除此以外，《概论》还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等重要文化观念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探讨，予以客观评价。

以上问题，都是研究近代文化不能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阐明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整体上把握近代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质。作者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既注意到社会政治经济对文化产生的影响，又强调了近代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结论令人信服。

二、综论与分述相结合写作体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出现了“文化研究热”，出版了大量论述文化及文化史

著作，为繁荣我国的学术园地锦上添花。就各种论述文化史的著作而言，在写作体例上不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按整体综合的体例来撰写，一种是按具体领域分门别类来撰写。两者各有长短，优劣互见。前者的长处在于能够比较充分地展示文化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宏观问题，诸如文化形态、文化特征、文化结构、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认识某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特征和性质，而对于部门文化中的具体状况则难于表现。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离开具体领域来谈文化，文化将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玄之又玄的东西。后者虽然能够细致地描述微观文化领域的千姿百态，但却拙于表现综合性的内容。因为文化并不是各个具体领域的简单拼凑，它要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又影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而各个具体文化部门也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不是单纯具体领域分门别类的阐述所能概括得了的，需要通过综合性的论述才能进行全面的揭示。基于以上认识，《概论》在写作体例上采取综合论述和具体阐述相结合的编撰方法，试图综合二者之长，比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全景式地展现其丰富多采的历史画卷。

《概论》包括综论和分述两部分。前 4 章为综论性内容，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发展变化、中西文化论争，以及一些重要的文化观念。后 10 章是对具体文化领域的分别论述，涉及到社会思潮、儒学、史学、新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社会风俗、文化事业及团体等 10 个方面，比较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诸多问题。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给读者以全面、系统的知识概念。关于综论方面的内容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兹不赘述。这里主要谈谈关于文化微观领域的表述。

《概论》用了 10 章的篇幅详略有当地描述了近代文化一系列微观领域的发展变化。这些具体文化部门虽然相对独立，但却有着共同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都面临着如何应时应变的问题。尽管这些微观文化领域材料浩瀚，内容丰富，但是《概论》作者却能够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予以说明。值得提出的是，所提到的 10 个具体文化部门有一些是以往研究的薄弱领域，如近代儒学、社会科学新学科、宗教、社会风俗、文化事业和文化团体等。这些内容在一般的近代史著作中很少提及，有的尽管提到，但只作为辅助性的内容一带而过，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概论》一书由于撰著宗旨使然，则对这些内容做了系统阐述，为该书内容大增新意。

儒学是秦汉以后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鸦片战争以后，传统儒学受到西学的冲击，不得不发生新的变化。关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般论者涉及较少。《概论》第 6 章专论“儒学”，把近代儒学的时代特征概括为 4 点，即“儒学趋向于经世致用”、“儒学各派的兼采会通”、“儒学与西学的会通”、“儒学正统地位的失落”。这 4 个特点既反映了儒学内部的自我调节，又反映了儒学对外来冲击的应对，还表现了儒学在近代发展的总趋势，概括得比较准确和全面。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影响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涌入中国，得到传播，一些新兴科学在中国先后建立，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面貌。在一般的近代史著作中，讲新兴学科大多只谈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和进化论的引进，其他方面或者一笔带过，或者不予涉及。而这些内容，尤其是近代社会科学新兴学科，却在《概论》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该书第 11 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题，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传播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系统论述。第 8 章则以“社会科学新学科”为题，详细叙述了近代新兴社会学科的形成发展，提到哲学 、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 7 个新学科。尽管不是面面俱到，但却包括了新兴社会学科的主要内容。对每一学科都以一节的篇幅，介绍了它们的输入、传播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这些论述从总体发展上概括了近代新兴学科在中国形成发展的基本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宗教文化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宗教门类繁多，诸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不一而足。而这方面内容同样是以往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近代史著作大多只在谈到教案问题时才涉及到西方基督教的一些情况，对其他宗教则语焉不详。《概论》第 12 章专论近代宗教问题，重点谈了“基督教的东渐”和“近代佛教”两个方面。书中对西方基督教在近代对中国的渗透、扩张做了系统的论述，既展示了总的发展状况，也描述了各教派的具体活动，以及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关于近代佛教，《概论》讲了佛教在近代的兴衰和佛学的流行，尤其对近代佛学的阐述比较系统，对近代各时期一些著名思想家的佛学研究也做了具体分析。

社会风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一般的近代史著作中，社会风俗是不列专门章节叙述的。《概论》的第 13 章专讲社会风俗问题。作者把社会风俗分为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两个基本方面，通过探讨移风易俗的思想主张和实践、生活习俗的变化、礼俗的变革、妇女和婚姻等 4 个问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风俗的特点和变化，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新兴文化事业和文化团体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建立了诸多新的文化事业。这是近代西学东渐的表现，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谋求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结果。该书第 14 章从近代报刊、近代的出版机构、近代的图书馆事业、近代的文化团体等 4 个方面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其中的很多问题为一般近代史著作所未及，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概论》在写作体例的设计上把宏观综论与微观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容纳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在论述中注意综合百家之长，吸收学术前沿新成果，对于近代文化领域的状况和变化作了生动的展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三、潜心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

《概论》一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成员长期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有着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该研究室是在龚书铎教授的主持下于 1984 年成立的，是在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的研究近代文化的机构之一。参与发起两次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1986 年被批准获得博士点的授予权。多年来，研究室成员在龚书铎教授的带领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开展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概论》一书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是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概论》尽管是一本不到 25 万字的著作，但是它的内涵与包含的工作量很大的。此外，《概论》还吸收了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正如作者所说：“书中各章的论述，有的是我们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有的则是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术界在中国近代文化一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撰写这本小书很有助益。没有这些研究成果，这本小书是难以编成的。”(前言)

当然，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都会有不足之处。《概论》也不例外，如关于语言文字、国内各民族文化发展交流以及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因受篇幅所限，有的论述文字较少，有的未予涉及，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另外，在校对方面还有一些错误。如该书第 58 页将《新青年》创办时间印成“1995 年”(应为 1915 年)，第 130 页的“总教习”错印成“总数习”等。

总之，作者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系列问题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初步形成比较系统的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并在编写体例方面做了新的探索，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概论》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综观全书，还是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内容科学严谨、具有弥补学术研究薄弱环节意义的力作。